



《汉书》及其著作者

□ 王子今

在有关中国古代史学文献的历史记忆中,“《汉书》下酒”的故事,可以明朗地表现《汉书》特殊的文化魅力。宋人龚明之的《中吴记闻》记载,名士苏舜钦性格“豪放”,据说“饮酒无算”。在岳父家,每晚读书,饮酒一斗。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子弟私下察看。听到他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抚案感叹:“惜乎!击之不中。”于是满饮一大杯。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说:“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又举一大杯。杜衍听后大笑,说道: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

(一)

张良事迹最早见于《史记》,为什么如此生动的阅读感受却发生在“读《汉书·张子房传》”的故事中呢?这是因为据中国史学学术史的记录,人们对《汉书》的普遍重视,长期超过《史记》。《汉书》注本东汉已经出现。隋唐以后,研究《汉书》的“《汉书》之学”兴起。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当时《汉书》之学大行。”有人请教苏轼读书经验,他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黄庭坚也曾经说:“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古今”就是史学。《汉书》被看作史学典型性成就。洪迈《容斋随笔》写道:“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莛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谓尽善矣。”明人王鏊发表过这样的评价:“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愧司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指出班固《汉书》无愧于司马迁《史记》,后世史学论著皆“莫能及”,因此班固无疑可以称作“良史之才”。应当说,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分别体现出两位史学家的思想个性和学术个性。或说“马班之史,李杜之诗”,“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或说“譬之名将,子长之才豪而不羁,李广之骑射也;班孟坚才赡而

有体,程不识之部伍也”。

《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史记》之后,列名“二十四史”的第二种。《汉书》的体例,对后来的纪传体正史影响很大。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汉书》是最为全面、最为完备的史籍。就保存新莽历史资料来说,《汉书》是无可替代的史籍。由于刘邦因灭秦而建国,《汉书》也保存了秦史的资料。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汉书》基本沿承了《史记》的记载,但是由于作者历史观的差异,材料取舍标准不同,也往往增补新的重要内容。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的记述,《汉书》的史学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撰写方式,新创《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又书写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其叙事格局更为严整完备。全书100卷,包括“纪”12卷,“表”8卷,“志”10卷,“传”70卷。后人根据各卷容量,析为120篇。《汉书》喜欢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这也是诸多学者积极参与注说,形成“《汉书》学”的原因之一。

(二)

《汉书》的主要著作者班固建武二十三年(47)前后入洛阳大学。建武三十年(54),父亲班彪去世,班固自太学返乡,在班彪续补《太史公史》之作《后传》的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后汉书·班固传》写道:“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穷究百家,不拘章句,虚怀谦逊,体现出优秀学者的资质。回归乡里后,他以为“(班)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来被举报“私改作国史”,收捕入狱。由于此前有同乡因文字传播下狱处死事,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郡级司法部门严酷处置而“不能自明”,急驰至洛阳“诣阙上书”,幸得召见,而被没收的论著恰好也呈送到京师。汉明帝“甚奇之”,于是召致朝廷图书管理部门,任为“兰台令史”,参与了《世祖本纪》等史书的撰述。汉明帝又明确指令班固继续完成前所著书。班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受

诏”之后,“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在汉章帝建初年间大致完成了《汉书》的主体部分。据说“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还有史学以外的其他论著。如“上《两都赋》”,澄清了有关长安至洛阳行政中心转移的某些疑议。班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皇帝“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并积极参与政事咨询,并得到肯定,“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来迁转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讨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白虎通义》,成为影响东汉以后意识形态方向的儒学思想规范。班固又曾“作《典引篇》”,正面宣传“汉德”。在“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对策的参议中,班固的态度是积极的。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命“以母丧去官”的班固为中护军。汉和帝永元元年(89),汉王朝远征军与南匈奴合击北匈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汉军出塞,大破北匈奴,“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燕然山在今蒙古国杭爱山。据班固受命撰写的《燕然山铭》记载,窦宪军“经碛卤,绝大漠”,终于“乘燕然”,实现“恢拓境宇”的新局面。《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窦宪建议派遣班固率数百骑出居延塞迎之,后来因匈奴内变,中途返回。考察班固的生涯,于史学著述之外,曾颇为活跃的政治实践。由于与强势外戚窦宪的特殊关系,直接卷入了高层政争。

(三)

窦宪集团败落,班固免官。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固教子不严,“诸子多不遵法度,更人苦之。”子弟不能守法,成为地方行政的难题。洛阳令种兢出行,车骑队列遭到班固家奴阻碍,从吏予以惩处,“奴醉骂”,种兢大怒,然而因为畏惧窦宪权势,未敢表露。及窦宪以谋反被诛,其附从者都被逮捕,种兢收捕班固。班固死于狱中,时年61岁。事后汉和帝谴责种兢,主持此案的官员抵罪。有的历史学者这样记述班固的人生结局:“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道,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

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这样的说法忽略了“(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的重要情节,对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的指责,语调严厉,似尚可斟酌。

《后汉书·班固传》最后的“论曰”,赞扬“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指出公认“二子有良史之才”,“信哉其能成名也”。同时也说到班彪、班固讥讽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揭示“二子”文化理念与史学视角有颇多不同。又写道:“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说班固感叹司马迁博学多智,却不能因此知识优势免受极刑。《后汉书》的作者随即指出班固其实走向更悲惨的结局,“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其实也指向了自己。什么是“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北宋司马光在一篇政论中说道:“古语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见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见目睫。非不欲兼之,势不可也。”班固观史,可以“见百步”,“察百步”,现实生活中却“不能见目睫”。历代有这样的史学家,研究历史、理解历史,可以清醒地“见”“察”,而眼前的“目睫”,却不能认知。

班固最终并未实现《汉书》定稿。吴树平写道:“班固卒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班固早年曾不惧风险,立志修史,然而后来因帝王豪贵的“亲近”与“恩宠”,置身政治漩涡,在血腥的权力争夺中丧生,致使曾经热爱的学术工作因此中止。班固人生所谓“身陷大戮”者,是史学家的悲剧,也是史学的悲剧。

历史文化

典籍

跨文化管理的三大举措 「一带一路」企业

□ 邓凌云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化经营,不仅带动了“一带一路”各参与国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不同区域、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随着“一带一路”各国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在东道国雇用当地员工成为一种常态,企业文化形成了中国与东道国文化多元共存、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如何促进中国文化和东道国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创新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已成为

提高合作质量,提升企业软实力,从而持续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带一路”企业跨文化管理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企业跨文化管理意识有待提升。有的企业将工作重心放在抓经营、创效益上,忽视与东道国员工之间的文化沟通,忽略对东道国员工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价值观的观照。二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理念需要转变。有的企业片面地、不加鉴别地接受东道国本土文化,从而淡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以大局为重”等优秀思想,削弱了企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三是企业跨文化管理人才比较稀缺。“一带一路”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他们在工作理念、工作态度、工作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以及跨文化管理人才队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此外,小语种管理人才也比较稀缺。语言不仅是打开国情、社情、民情大门的“钥匙”,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形成文化认同与文化共鸣。因此,小语种人才培养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在“一带一路”参与国中,除汉语和英语外,通行的官方语言达50多种。但在当前的外语教育中,英语教育一家独大,小语种人才培养不足的现象仍比较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跨文化管理。

在“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只有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持续推进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明共荣、文化共兴的发展态势,不断增强中外员工之间的尊重、包容与互信,才能使企业跨文化管理从根本上发挥增强企业凝聚力、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各国经贸

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充分认识跨文化管理的重要性。跨文化管理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凝聚作用。在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形成一种多元化、差异化文化融合并存的新型企业文化,用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员工紧紧团结在一起,与企业同甘苦、共命运,共同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而努力工作。二是激励作用。用新型企业文化激励人心,使中外员工的价值观认同趋于一致,引导员工从内心生发出为企业发展而奋发拼搏的思想动力,自觉把企业的发展当作自己的目标追求。三是导向作用。用新型企业文化引导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文化虽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却能够产生支撑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促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建立企业,不是做“一锤子”买卖,而是谋求长期合作,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通过有效的跨文化管理,让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企业员工心中,凝聚人心、激励人心,自觉产生为企业服务的动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整体竞争力。

其次,要正确选择跨文化管理的方法。“一带一路”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应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双方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双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构建尊重双方文化差异、消除双方文化冲突的文化环境,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员工的文化需求,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一是在企业园区内,设置一些反映中国和东道国经典文化的景观,潜移默化地对员工进行跨文化熏陶。二是定期邀请中国和东道国的文化专家为中外员工集体授课,介

绍两国文化异同和各自优越性,指导员工阅读相关书籍、观看影像资料,丰富文化知识结构。三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组织员工探讨两国文化异同及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尝试建立新的企业文化,传递企业精神与企业核心价值观,并与各国员工行为规范融为一体,形成企业跨文化管理的新模式。四是通过组织各具双方文化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企业员工进一步体会到双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彼此了解和互信。五是对双方文化的重大差异,比如饮食禁忌、服饰特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予以充分理解和尊重,避免产生文化冲突。

最后,要培养跨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日益扩大,各国间文化差异大、国情民情不同、需求利益各有侧重的特点将愈加显著。“一带一路”企业应有意识地根据文化差异背景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重视企业跨文化管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抓住企业跨文化管理的主动权。同时,要大力培养小语种管理人才。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紧缺综合性、复合型人才现状,国内各高校应在推出小语种语言课程的基础上,推出国际经贸、法律、金融、财务管理、土木工程、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方向的专业化课程,探索培养小语种+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一带一路”跨文化管理的需要。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先导作用,高等教育强国要率先建成。坚守教育的初心和使命,必须以立德树人统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并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紧紧围绕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以忠诚和担当交出优秀答卷。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确立并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高等教育一边连着科教兴国战略,一边连着人才强国战略。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和要求的“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牢牢抓住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以强烈的进取精神、责任意识,担当实干,把工作落实落细做到位,推动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高校是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汇激荡点,高校青年学生是卓越人才培养的最大群体,他们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需要我们精心引导和栽培。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政治站位、铸就政治忠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事业上的实干者。进入新时代,天津大学在统筹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紧紧围绕新时期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学校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制定了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发布实施“一流本科教育2030行动计划”,坚持立德树人、坚持通专融合、坚持贯通培养,构建一流卓越人才培养体系。

二是紧紧围绕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加快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等一系列要求。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师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健全教师发展培训机制,实施青年教师岗前培训,提高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落实定期全员培训制度,持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要建立教育学的科教协同机制,建立“高层次人才上讲台”制度,鼓励教师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知识体系和教学内容,促进科研与教学良性互动。广大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要强化使命感、责任感,把坚持立德树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好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天大的事业。近年来,天津大学实施“教师职业发展计划”“工科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计划”“北洋名师助教计划”等,完善教师教学荣誉体系,发挥优秀教师、优秀教学成果的示范与辐射作用,形成了全体教师“热爱教学、精心教学、荣于教学”的浓郁氛围。

三是紧紧围绕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加快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正处于深刻的根本性变革之中,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8年教师节,党中央召开全



□ 现金龙

以立德树人统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动员令,部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生命线,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加快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情况看,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不平衡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既有高等教育内部的,也有高等教育外部的;不充分既有阶段性的,也有长期性的,既有质量的,也有数量的。加快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必须聚焦主要矛盾,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拼搏奋进的行动姿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卓越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培育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以此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回应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关切,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2019年4月,教育部等14个部门和单位在天津大学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意识”再启蒙,掀起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革命”,以此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评论